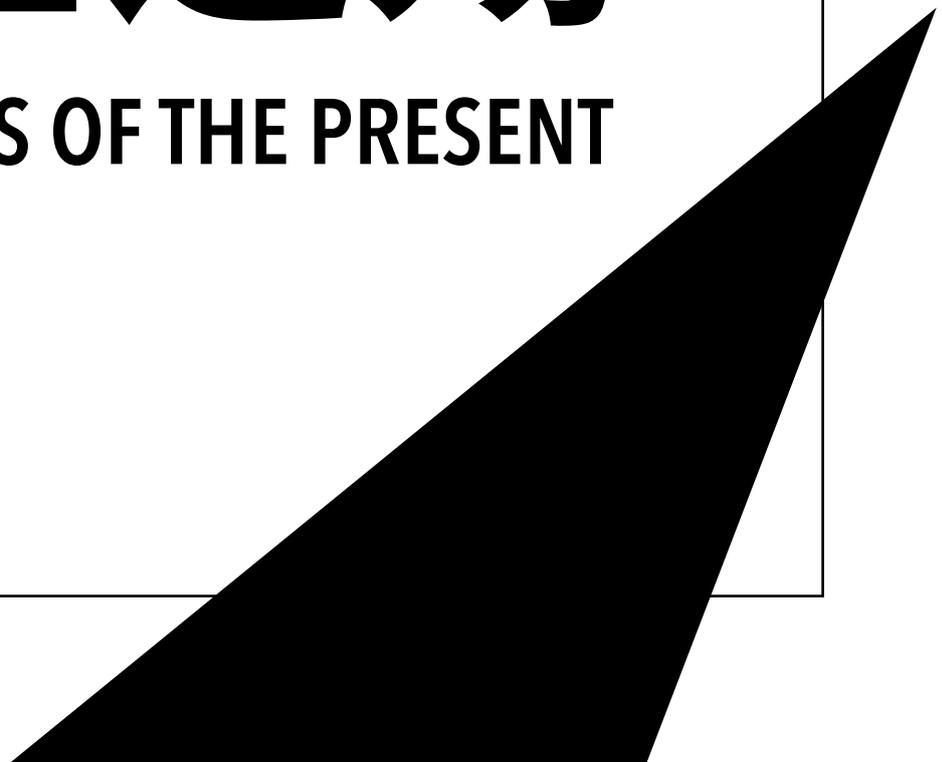
A large red geometric shape, resembling a triangle or a sector of a circle, pointing downwards from the top left towards the center of the page.

2018.03

三大洲工作文件No.1

现世之殇

IN THE RUINS OF THE PRESENT

A large black geometric shape, resembling a triangle or a sector of a circle, pointing upwards from the bottom right towards the center of the page.

现世之殇

Vijay Prashad.



荷斧入林，树见其曰：此斧之柯，乃吾林之木。

(土耳其谚语)



每几个月，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会发布一份工作文件，激发关于重要事件的辩论。

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可以对这些文件进行复制、翻译或者是讨论其中提出的问题。我们衷心希望读者们能够觉得这一系列文件很有用处。

我们随时欢迎大家的批评以及指导性的意见，不管是关于工作文件的内容，还是关于形式本身。

如果您对这些文章有任何评论，或是想为该系列供稿，

请发送至 vijay@thetricontinental.org 或 documents@thetricontinental.org

海地电影制作人——哈乌·佩克 (Raoul Peck) 曾拍摄了一部名为《青年卡尔·马克思》(Der Junge Karl Marx (2017)) 的电影，该电影的开机地选在了在普鲁士的森林，镜头中的农民们俯身采集着落木，看上去又冷又饿。突然从远处传来了一阵马匹的嘶鸣声，卫兵和贵族就在不远处，他们是来宣告对整片森林的拥有权。受到惊吓的农民拔腿就跑。但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乏力，很多人半路就倒下了。贵族和卫兵拿着手中的鞭子抽打着他们的身体，或用长矛刺向他们。部分农民死去，他们甚至连一片落木都没能得到。

时间回到 1842 年，那时年轻的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正生活在科隆，当他得知德国农民所遭遇的暴力时，他感到十分沮丧。他写道：这些农民知道他们将要受到的惩罚：鞭打、甚至是杀害；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所犯何罪，他们到底是因为犯下了什么罪而遭到如此惩罚？

佩克的电影的巧妙之处在于用这样的一种困境来作为序幕。因为这抛出了一个当下所有敏锐的人都会问的问题：世界上的穷人是犯了什么罪而要遭到如

此惩罚？贫穷以及战争使得人们四处流亡，遭受饥饿和轰炸。想要逃离困境的人们被束缚住，想要挣脱却不得。他们清楚他们将要面临的惩罚：食不果腹、百般凌辱以及随时都有可能到来的死亡。这一点他们知道。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犯了何种罪。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而要受如此重罚？

2010 年在海地发生了一场破坏力极强的大地震，多米尼加裔美籍作家朱诺·迪亚斯 (Junot Diaz) 于地震后到访海地。在一篇令人难忘的题为“天启”的文章中，朱诺·迪亚斯指出：海地提醒我们注意资本主义的僵尸阶段 (zombie stage)，整个国家正因“经济魔法”丧失了生气。在过去，僵尸是那些生活以及工作都被魔法控制的人群。旧的僵尸不分昼夜地工作，没有一丝的喘息片刻，新的僵尸连工作都指望不上——他们只是坐等死亡的来临”。

新的僵尸不被允许寻找食物或者寻求庇护或医药。实际上，年轻的僵尸必须等待死亡。这是对他们的惩罚。但是他们所犯何罪呢？

第一部分：结构

人类的分歧



生而为人，历经沧桑方成仁。

阿克巴·伊拉哈巴迪



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消灭北韩、伊朗以及委内瑞拉。特朗普的前任乔治·沃克·布什 (George W. Bush) 曾在 2002 年称这些国家为“邪恶轴心” (Axis of Evil)，但并未把委内瑞拉列入其中。当时他们把伊拉克被视为“邪恶轴心”国之一，美国于 2003 年轰炸伊拉克——其非法入侵伊拉克计划之一。在那之后，美国也摧毁了利比亚以及其它国家，包括海地（现在基本上被美国和联合国占领）。美国就像一头受伤的巨龙，它把它的尾巴甩向了整个星球，向人们喷火——摧毁许许多多的国家，消灭众多的敌手。它的伤口并没有给它带来致命的伤害而是战略上的谋划。美国仍然拥有世界最强的军事实力，它能够通过空袭以及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摧毁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它动用武力，并没有每次都得逞。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它并没有被人们尊崇为神，它有它自身的缺陷。那些并不屈从于美国暴力的人道主义国家将会紧紧地盯着，不会放过美国的一举一动。

帝国主义的内心顽如钢铁。它使用它地强大无比的军事力量来对抗人类，之后又很合时宜地忘却

给人类造成的惨痛。1945 年美国对日本使用核武器，20 世纪 50 年代轰炸朝鲜，20 世纪 60 以及 70 年代又大规模轰炸越南，此外它常年向阿富汗发起进攻使得阿富汗处于无休止的战争中，它又摧毁了伊拉克和利比亚。美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但它从未表示要负任何的责任。他们的内心已经硬如钢铁，美国向阿富汗投掷大规模炸弹时，毫无恻隐之心。迫于美国和阿富汗政府的压力，当地掌权者出于安全考虑拒绝让记者们进入现场。被爆炸地点周围的人们发言了，他们的话语不禁让人感到胆寒。穆罕默德·沙扎德 (Mohammed Shahzad) 说：“地球就像风暴中的一艘小船，“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阿钦 (Achin) 的市长——Naveed Shinwari 反映：“毫无疑问 ISIS 是残酷的，他们对我们人民施暴。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投掷炸弹，它吓到了我们的人民，我的亲戚都认为世界末日到来了。”

当世界似乎处于资本主义引起的气候紊乱和核战争边缘时，这感觉就像是一个毁灭的时代。

所以现在是时候停下来倾听灭顶之灾的亲历者给我们留下的沉甸甸的那些讲述，那些美国对日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幸免于难的民众。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弘中虎子 (Torako Hironaka) 在日记中列举了她回忆中的场景：

1. 一些烧毁的工作服
2. 一位裸体女性
3. 裸体女孩哭喊着“愚蠢的美国”
4. 一片西瓜田
5. 死猫、死猪和死人，人间炼狱

原子弹爆炸后，蜂谷道彦 (Michihiko Hachiya) 在他的《广岛日记》(1955) 一书中描述：

那些尚能动弹的人们默默地朝远山的郊外移步，他们精神崩溃，意识涣散。当问及他们从何而来，他们手指着那座城市，口中说着“那边”。当被问到他们要去何处，他们的手指移开了城市，说道“这个方向”。他们失魂落魄，神情恍惚，不知所措，机械地拖着脚

步向前走去。他们的行为震惊了身处这场灾难之外的人们。于是外人们充满惊讶地报道他们的所见：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木然地挤在一条狭窄而又崎岖的小道上，但是旁边却是一条顺畅平坦、方向相同的路。外人难以置信他们正在目睹成群结队的人们梦游般地行走着。

当灾难近在咫尺之时，广岛原子弹轰炸的幸存者 (hibakusha) 的话语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至关重要。这些话语是对骄傲自满的警告，是人类生存的温暖的展现，是对铁血无情以及千愁万恨的抵抗。

飓风、海平面上升、加勒比海群岛被疾风以及洪水摧毁、南太平洋诸岛沉入海洋——自然灾害的破坏力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洪水淹没了土地，正如资本淹没了人类对生存的渴望。国际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对于这个地球上数百万的人来说，拥有一份正式工作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对于军队人员来说，他们总会有个职业，因为战争永不停歇。摆在年轻人前方的是无情的未来，他们对人类的信任微乎其微。

人类之间有分歧，仿佛一道墙将我们隔开。有些人民生活在战乱不断、灾难重重的地区，有些人民对和平抱有幻想、生活在为战争制造条件但又矢口否认的国家，他们之间是有隔阂的。

如何理解一个被失业、灭亡、贫穷、气候灾害以及战争蹂躏的世界？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概念来理清这个复杂的现实？源于北美实证主义的思维模式——博弈论、回归分析、多层模式、推论统计，也无法给我们的情况提供一个一般理论。这些思维模式仅对权利只有浅层的理解且对于世界上精英的角色一无所知，也只会解释我们世界的这个或那个方面。

但是他们能够解释全球化造成的地方危机、新自由主义未能解决这一危机、以及新法西斯主义的出现（目前的共识是新法西斯主义可以解决这一危机）三者之间的关系吗？他们有诸如帝国主义的概念吗？这些概念对于我们调查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第一原则所幻想出的世界）十

分关键。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什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想要轰炸这个国家，或者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想要从那个国家身上挖块肉？他们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花更多的钱建造武器库镇压人民而不是社会物资的生产吗？他们能够解释为什么街道上警察很多而工人以及艺术家却很少吗？

全球化



人们的收入从哪里来？不止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想知道。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用于解释全球范围内社会生活枯竭的概念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一个政策平台，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世界银行等跨国机构以及掌控这些机构的知识分子所设计。这些知识分子接受了资产阶级的逻辑，即造就历史的是企业的创造力而不是人类的社会劳动。他们说，是公司创造了工作，且为了让经济运转，我们必须满足公司的需求。他们认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资本——公司以及企业家，而不是社会劳动者——那些为我们的未来构建蓝图、辛勤劳动生产商品巩固我们所在的现实的工人。

批判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学者把目光投向了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 以及美国总统罗纳·里根 (Ronald Reagan) 的项目来解释新自由主义是如何改变世界的。这些领袖似乎如巫师一样, 能从虚空中变出公共政策, 通过世界上各个机构来推动他们议程。他们捍卫受保护的公共用地的私有化以及争抢社会资源。事实确实如此。但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会倾向私有化以及争抢资源呢?

用理想主义的方法来看待人类历史是不够的, 新自由主义并不是空穴来风。这些政府利用新自由主义来解决全球生产模式的结构变化引发的实际问题。资本主义始终寻求全球市场, 渴求摆脱国家政府的框限, 急于找到新资源和新技术从而能以更低的成本来生产商品并以更高的价格卖给新市场。但是资本家的巨大全球野心受到了技术的限制 (比如说无法从全球实时获取信息), 以及遭到工人阶级运动的阻挠: 他们要求民族国家限制资金的使用, 使劳动者受益。但是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为止, 技术障碍已被克服, 并且工人阶级的力量几乎消耗殆尽。资本家现在有能力登上战车从高处观察全球——通过他们的卫星俯瞰整个地球, 获取信息并存储至他们的电脑, 寻找最廉价的工人以及最昂贵的市场。这一资本家的上帝视角开启了全球化时代。

一个真正奇幻的时代为资本开启科技发展迅猛, 工人们排起了一列纵队涌入全球工厂; 尽管全球弱势国家提出政治反对意见, 但是为了保护资本利益, 新的知识产权制度也得以发展。工人以及农民拥有的一切悉数流入了资本家的手中。现在我们确实可以说国家的职能就是管理资产阶级日常事务的委员会。

西方财政体系引发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奠定了全球化的政治条件。1979 年美国利率的急剧上升——沃尔克休克法 (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 (Paul Volcker) 命名) 撼动了第三世界的经济体。沃尔克通过他的货币政策把美国的通货膨胀转移到世界上的其它国家。美元的高利率意味着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 (London Inter-Bank Offer Rate, LIBOR) 的飙升。第三世界国家现在背负着商

业银行以及西方政府的巨额债务, 但这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15 个高负债国家的处境 (基于世界银行的评估) 即为例证。在 1970 年, 这 15 个国家的外债总额达到了 179 亿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9.8%)。到 1987 年, 在债务危机形势紧张之时, 这个数字飙升到了 4022 亿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7.5%)。无论是债务还本付息还是利息支付都是一笔庞大的金额: 1970 年已高达 28 亿美元, 到了 1987 年又上升至了 363 亿美元, 到了无法应付的地步。到 1991 年, 数字已经高得不受控制: 第三世界的外债总额为 1.4 万亿美元, 是这些国家出口总额的 126.5%。这意味着欠商业银行以及政府的金额超过了出口商品以及服务所赚的钱。

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摧垮了这些国家向他们的民众提供社会商品的能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指出, 这次债务危机导致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平均收入下降了 25%, 这是垮掉的十年。在 37 个全球最贫穷的国家, 削减了 25% 的人均医疗支出以及 50% 的人均教育支出。UNICEF 的关注点在于孩童。据其估计, 受债务危机影响, 在 1988 年 50 万孩子会死于可以防控的疾病。UNICEF 提醒道, 这意味着每天会有 4 万名儿童因金融体系而死亡。此时, 坦桑尼亚的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 (Julius Nyerere) 义正辞严地发问道: “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忍饥挨饿才能够偿还我们的债务吗?”

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摧毁了非洲、亚洲以及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政治自信——这意味着当公司来谈判“自由贸易区”以及其它好处时, 他们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债务危机削弱了后殖民国家的谈判能力, 削弱了他们领导人的决心以及国家精英们的文化自信。依赖是缺乏独立的结果。布基纳法索的托马斯·桑卡拉 (Thomas Sankara) 提醒道“那些喂养你的人也会控制你”。所以现在这个提醒应验了。

全球化的新的大厦正是建立在这些孩子的痛苦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软弱之上。这个新动态包涵三个要素: 新科技的发展, 上百万新工人为垄断公司实施它们的财富积累策略以及建立一个新的知识产权制度。

首先, 新兴科技——比如卫星通讯、电子计算机化以及货柜船, 使得公司能够管理全球实时数据库以及尽可能快地运输货物。公司能够拆解工厂, 同时也在许多国家将他们重新组建, 这一过程被称为生产脱节 (disarticulation of production)。每个工厂生产最终产品的一个部件, 公司能够凭借其专有数据库提供的详细信息判断在哪个国家能够最好且最廉价地生产所需的产品。资本家们不需要在市场附近建立工厂或是建立一个大型工厂, 这样的日子已经结束了。现在资本家能够利用投入成本价格的小幅变动在很多地方建立更小的工厂。由于运输技术的进步, 比如: 集装箱运输, 资本家能够快速且以相对廉价地运输商品的部件, 而且可以很轻松地就把商品运输到市场上。现在可以利用科技的方式来把生产基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第二, 由于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USSR) 解体以及中国的劳动市场向外资开放, 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第三世界工程的壁垒开始在 20 世纪 80 年代崩塌。数百万此前没有受到资本主义需求控制的工人, 现在成为了资本主义市场的猎物。他们只有等待脱节的工厂进入他们的生活。

第三, 1986 年到 1994 年, 资本家进入了关税暨贸易总协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s, GATT) 最后一轮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来确保知识产权的掌握在资本家而不是社会的手中。此前, 知识产权属于商品生产的过程而不是商品本身。这使得人们能够找到新的方式方法来制造商品, 从而提高科学技术。商品的逆向制造已经成为可能, 这对于贫穷国家的制药部门来说至关重要, 因为他们能够为穷苦百姓研发救命的药物。1994 年 GATT 的最后一轮谈判促成了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成立, 在此之后知识产权的观点改变了。现在商品本身也申请了专利, 这意味着资本家能够从任何生产该商品的人身上收取租金——无论这些人自身发挥了多少的创造力。这也意味着在资本的核心区域以外的地方 (比如北美以及西欧) 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将会受到这一新的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此外, 这个新的知识产权框架——通过纳米技术基因组学以及转基因学的专利权,

赋予主要的食品公司新的农业权力, 能够超越对土地的控制。它还“为信息公司”提供了驱动其发展到“数字殖民化”的基础, 即通过消费者监督的新方式以及通过主要传播西方的内容给全球人民, 大型“信息公司”窃取数据来巩固新的欲望 (“网络中立”这一社会网络原则的慢慢消亡就是数字殖民化的另一个标志)。这是脱节生产架构的新法律框架。

世界贸易组织是在经济学家 Omar Dahi 所称的“大谈盘” (Grand Bargain) 后成立的。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由于受到了债务危机的破坏, 放弃了工业政策以及对于工人和市场的保护, 得到的回报仅仅是出口它们的农业以及提取的原材料。事实上, 失去的却是工业以及农业的经济主权。

这些技术发展、数百万的潜在工人以及新的知识产权规则使得公司能够在全球的范围运营。他们使用了全球商品链上两个不同的策略来生产货物以及提供服务。首先, 他们把所有的生产流程转移到海外的一个国家。这叫做外国直接投资 (FDI) 外包。这里, 跨国公司仍将不得不把钱投资到其它地方来建设生产的实体基础设施。第二, 跨国公司只需雇佣承包商来生产货物, 他们将互相抗争到底。正如政治经济学家约翰·史密斯 (John Smith) 所说, 这种“公平外包”允许跨国公司来节约它们的资本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几乎不承担任何风险。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通过 FDI 或是通过公平外包, 资本在劳动力套利中都有优势, 使用更廉价、更弱小的劳动力来生产产品, 同时挖空全球北方和南方的社会。

新的生产地通过移除工会以及国有化——这两大壮大工人力量的体制框架来削弱工人的力量。在这些利润很低的公平分包公司中, 雇主用尽残忍的方式压榨可被替代的工人, 工人们如何建立工会? 国家如果由工人们接管, 却不控制商品生产的全过程, 如何使生产过程国有化? 这些方式没有一个是工人可以获得的。他们改变世界的动力被出口加工区的集中营的特性以及美墨联营工厂 (译者注位于墨西哥境内, 属于美国公司) 所扼杀。

公平外包使得全球北方的公司能够不再把他们

们的资金投入到生产过程中。耐克、苹果以及其它类似的公司不把资金投入到工厂中。他们是品牌公司。他们把品牌外租获得的利润是巨大的，但是他们没有充分地把这一利润重新投资到生产性企业中。难怪公司坐拥大量现金或是把高额的资金投入到不事生产的金融行业中。他们不把这些钱投入到生产性企业或社会公益，却在金融圈囤积居奇，试图以钱生钱，而跳过生产这一环节。所以控制这些大公司的人变得十分富有，然而他们的手上沾满了污秽。英国慈善机构乐施会 (Oxfam) 统计发现，目前有 8 位有钱人的身家加起来，相当于全世界最贫穷人口所拥有的财产的总和。缺乏投资生产的需要导致脱节生产以及金融领域膨胀，这两者建立起来的公平外包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这些有钱人的财富。

有钱人以及公司不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在过去 40 年间也吝啬钱财。北美公司自己在美国掌握着 1.9 万亿美元的资金，在海外账务中另外存放着 1.1 万亿美元。美国银行拥有 1 万亿美元的现金储备，总计 4 万亿美元。加上欧洲和日本公司以及银行的现金，总额达到了 7.3 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窝藏在卢森堡、新加坡、瑞士以及其它“银行避风港”的“黑钱”。国民经济调查局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的一项调查以及基于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表明，避税天堂拥有预计 5.6 万亿美元 (2007 年) 的资金。这些避税天堂拥有的离岸财富大概占全球 GDP 总额的 10%。在一些国家 (比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离岸财富超过 GDP 总额的 70%。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以及阿根廷的精英们使他们国家的离岸财富占 GDP 总额的百分比全球最高。资金的大量囤积意味着最富有的国家和个人已经把停滞外包到世界的中心，他们拒绝把这部分现金投入到社会劳动中，他们坚持削减国家预算——这笔国家预算来源于工人以及农民的税收，而且他们坚持认为工人和农民应该保持较低的生活标准。没有比这个资金的结构性的限制，这个“投资罢工”更大的丑闻了。

鉴于这一严酷的现实，有必要发展用我们所谓的“税收罢工”这一概念。那些拥有资产、财产的人基本上都罢工反对税收体制。他们用庞大的资产来隐

藏他们的钱财或是改变税收法来使自身获得更好的保护。他们巨大的资金池没有被大量高效使用。如果动用了里面的资金，那么就会造成股票市场以及各种资产泡沫的膨胀。资金使用的最卑劣的手段在于金融的中心——华尔街。2007 以及 2008 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至今为止最大的资产泡沫破裂，是这个动态能够产生的动荡的一个案例。房地产繁荣的鼎盛时期，美国政府向银行提供的流动性被称作格林斯潘对策 (Greenspan Put)，美联储的主席很擅于让市场充满资金，这些资金被用来膨胀资产泡沫，比如房地产泡沫。没有一些实实在在的社会保障或是养老金计划，年老的美国中产阶级居民的退休就不得不以房价上涨为前提。这是主要的资产，所以美国的中产阶级心甘情愿地接受格林斯潘对策并且鼓励金融的发展失控以实现他们短期的利益。这就是格林斯潘对策所能够做到的——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上层部分的北美梦现在已经在攀升的房地产价格的基础中得以稳固。

如果房价给予美国的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中的上层部分退休的梦想，银行的借贷允许他们以远超他们收入的额度进行消费。美国市场作为世界市场“最后的买方”运作，继续消耗商品和服务以及全球各种资源。美国的消耗量是巨大的。美国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 5%，但是美国消耗了至少全球四分之一的能源。如果每个人都像美国公民一样生活的话，那么至少需要四个地球才能够维持人类的消耗。格林斯潘对策以及通过国际银行系统提供的信贷引发的消耗量使得美国消费者对于从中国到墨西哥的制造商来说至关重要。所以资产市场的通货膨胀和廉价信贷进入到美国的消费市场对于这个系统来说并非不理智，反而相当理智的。这套系统的设计方式是：其合理性将该系统从一个危机推向另外一个危机，从一个混乱到另一个混乱。

当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一个过度膨胀的泡沫破裂，格林斯潘——美国主要的货币主义实践者之一，说道他感到十分“震惊”。当格林斯潘于 2008 年来到美国国会的时候，一位加的州 de 国会议员亨利·韦克斯曼 (Henry Waxman) 向他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格林斯潘：我之前认为尤其是银行这一类的机构能够保护公司里他们自己的股东以及他们自己的股权，现在我觉得这一想法是错误的。

韦克斯曼：换句话说，你发现你对世界的看法，你的思想是不正确的，它行不通。

格林斯潘确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感到震惊，因为我四十多年来的经验一直充分向我证明，这套理论是相当正确的。

格林斯潘的思想和理论是有缺陷的，所以他感到惊讶，但是它对经济学领域或是他们的公共政策框架没有影响。货币主义毫发无损地摆脱了这场危机。宏观经济政策仍然掌握在技术专家手中，他们推崇的观点是，没有必要关于他们的选择作出任何政治性的讨论。在理论领域，他们高于政治，格林斯潘自己也曾告诉过美国国会这一理论是错误的。希腊前财政部长 Yanis Varoufakis 说得非常明白了：“如今政变的危险不是来自于坦克，而是来自于银行”。当中金聘请的说客以及举止良好的银行家给民主捆上锁链时，没有必要进行军事政变 (除非在一些特定国家)。

税收罢工使得个人能够获得多得无法想象的社会财富。这笔财富超过个人以及家庭能够消费的数额，这引发了对于慈善病态的崇拜。富有的捐赠者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比尔盖茨由于他在药物方面的工作而备受崇拜，其他富有的男人和女人被视作反抗贫困的拥护者。是这些个人成为了社会政策的主要推动者，反抗一个国家的民主需求。这样的话，公共政策更多地受到捐赠者而不是民主机构的推动。正如非洲女权主义论坛的莎拉·穆卡萨 (Sarah Mukasa) 所说，“我们必须警惕那些使经济和发展去政治化的企图，而且要防止这项新发展议程受捐赠者驱动。”

官方政策制定者 (得到大资本家的全力支持) 坚持认为公共官员应该平衡公共财政账目，随之而来的就是税收罢工。政府必须平衡他们的预算，即使资本家降低了对于国库的支出。这意味着政府被迫出售资产来募集资金从而继续维持他们的社会机构或是他们削减这些社会商品。财政责任以及税收罢工

意味着政府财政状况恶化。难怪施加给社会的压力现在从国家转移到了社会。隐藏的手所破坏的东西，隐藏的心必须把它们拼凑在一起——全球化的社会成本消磨着社会，社会的松松垮垮的纽带必须由三倍的劳动力来维系，主要是家庭中的妇女。

新自由主义



我只是不想要一个穷人。

唐纳德·特朗普



现代国家因为人民通过不断斗争赢得的承诺，不能立刻削减社会利益。育儿、教育、交通、新鲜空气、福利、养老金，这些统统都是国家迫于人民压力提供的。这些曾是现代文明最低限度的配置。是税收罢工、财政职责以及公众对于社会商品的需求导致了新自由主义。换言之，新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公共政策应对全球化危机的产物。

税收罢工、投资罢工和财政职责使得公共预算缩水。资产阶级政府根本无法履行自己的义务。以惨

痛代价获得的公共资产和未商品化的自然资源沦为了拍卖品。这种私有化用融资来维持现代国家难以为继的财政状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及商业银行对未大幅削减公共财政支出的国家施加债券降级、叫停短期融资等惩罚措施，防止其陷入破产境地。西方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防范之心早已路人皆知。2007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底，“只有86个发展中国家受到了评级机构的评级，其中15个国家自2004年起就没有获得评级。将近70个发展中国家从未被评级”。换句话说，这些国家被私人评级机构惠誉国际(Fitch)、穆迪公司(Moody's)和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等忽视了，所以难以从商业市场成功融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些国家的评级通常是不利的，反而让他们的融资成本更高。这些国家不仅因为GDP被低估(他们低价出口的宝贵商品一进入帝国主义地区就被高价卖出)吃了哑巴亏，还因为被视为高风险借贷国而受到歧视。这属于金融发展陷阱，资金匮乏的国家注定永远贫困落后。国有资产大甩卖被视为保住不断流失的国家预算的唯一出路。

通过私有化获取的资金持续用于履行偿债义务，购买昂贵的进口能源。这些资金没有用作基础建设，也没有增加社会财富，也很少用于投资拓宽民众职业技能的教育。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以及挪威经济学院的应用研究中心最近一项调查表明，2012年发展中国家接收到的援助、投资以及收入总额达到了1.3万亿美元。这是很大一笔钱。但是再看同年从发展中国家流出的资金，数额达到了3.3万亿美元。换言之，发展中国家共有2万亿美元的资本流入了西方国家。自1980年以来，流失的财富总额达到了16.3万亿美元。富国就像吸血鬼一样榨干了贫困，这种事情并非发生在殖民时期，而是在当今的时代中。从发展中国家流失的金钱有何特点呢？它分成三部分：4.2万亿美元用于偿还债务(几乎是总援助金额的4倍)；全球北方的公司赚取并汇回本国的收入；违规非法外逃的资本(不单是“黑钱”，还有贸易虚报，其自身的资本损失也已达7000亿美元)。因此，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用于社会基础发展的资金根本不易获得。

对于全球北方国家来说，情况也并不是那么乐观。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将社会发展的职责推向了私营部门。事实上，全球北方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经验已被稳步推向全球。对富人减税以及对公司将利润汇回注册所在地区限制政策的放宽使得国家预算中的资产减少。巨额的军费及安保支出损耗国家财源。钱不会用于基本的社会服务，比如教育以及医疗卫生。本应是社会职能的开支成了公民个人的责任。这导致公民因上学或者生病个人债务增加。年轻人以及下岗老员工被迫借债上学，因为教育或再教育是实现个人提升的最佳路径。美国的学生贷款债务达到了1.3万亿美元，英国这个数字是5000亿美元。社会商品的私有化模式被输出到其他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南非，印度还是墨西哥，学生债务不断攀升。在美国，85%的人都有健康保险，然而在2012年，美国居民自费医疗的金额达到了2.7万亿美元。201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40%的美国人难以支付医疗费用。医疗债务是美国个人宣告破产的主要原因。这种“美国模式”的私有化导致全球范围内因医疗费用而破产的案例越来越多。在印度，世界银行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发现2011年有5250万印度人因病致穷。世界银行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每年有一亿人口会因医疗费用支出而陷入“极度贫穷”。如果将极度贫困基准线从日收入1.9美元上调至3.1美元，那么每年贫困人口数将会升到1.8亿。

社会民主主义的一大成果——免费的大学教育在全世界范围内被不断裁减。大学债务让学生喘不过气来，无法激发创意。他们渴望选择一个能提升个人能力的专业，以便毕业后找到高薪工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将时间用在了寻找无偿的实习工作上，在过去二十年，实习工作数量猛增。还有一些学生报名上“辅导”班，来提高英语成绩，考入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他们抱有这样的一丝希望，在工作越来越难找的形势下，如果能得到一份好工作，也就“对得起”开始的付出了。这意味着那些挑战现世社会秩序的课程以及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思考的课程(无论是艺术课程还是科学课程)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大学渐渐变得不再是社会的孵化器，而是个人成功的跳板——

其动力不是雄心而是拼命还债的心理。这对学生的生活普遍造成影响。达累斯萨拉姆大学(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的伊萨·西威奇(Issa Shivji)教授说道：“曾经，我们的大学以成为争议的中心而自豪，现在我们却渴望成为卓越的中心，有争议的话，你就不可能卓越。”换言之，“卓越”扼杀了创新思维的活力，尤其是深深植入工人、农民以及失业者心中的反霸权思维。

那经济如何增长？新自由主义政策以释放消费主义的兽性为赌注，以借债支付，通过发明新技术、新资产奇迹般地提高增长率，产生可能以某种方式用于社会商品消费的社会财富。但是这些种种都没有发生。相反，消费主义以及新科技导致了负债，泡沫资产给世界经济带来动荡，产生一种衍生文明，一种建立在欺骗和盗窃之上的“文明”社会。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普通人只能背债。

为了维持经济运转，为过剩商品找到买家，负债本就是计划之中的事。在我们生活中所见之处，铺天盖地的都是激发欲望的各式广告。多家公司提出了市场细分的复杂理论，目标直指消费欲望的细化，创造消费亚文化。产生消费需求的是那些不必要的商品或是没必要更换的老款产品的新款(比如换新手机或换新车)。计划报废的动力当然有助于拓宽饱和的市场，但是同时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世界每年产生的垃圾达到了13亿吨，即每天产生1100万吨垃圾。据估计，在购买的商品中，99%都会在六个月内扔掉。世界银行表示，到2025年，每天的垃圾总量将会达到三倍，到2100年，年垃圾总量将会超过40亿吨。1950年以来，世界产生了90亿吨塑料垃圾，其中只有9%得到了循环利用。利用计划报废来扩大日益萎缩的市场的折射出的一个景象是：堆积成山的垃圾最终沉入海底，焚烧产生的有毒气体以及垃圾填埋场的有害物质流入到我们宝贵的饮用水以及肥沃的土壤中。成堆的垃圾、遭到破坏的大自然慢慢侵蚀着资本主义，无法再朝着资本主义构建的蓝图高歌猛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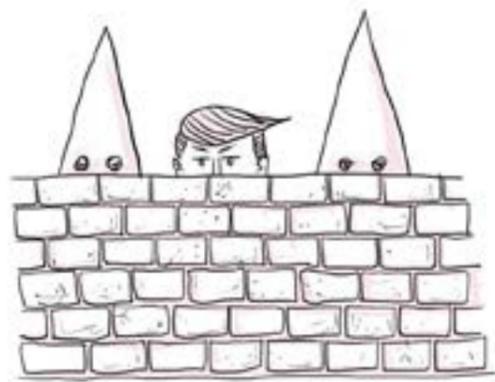
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政策，也兼具文化的作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魅力之处是要实现一个商品世界。但是这项政策的背后所宣扬的价值观是个人要以企业的角色自居。企业文化或是企业家精神等敏感词一出现就触动到了各路人的神经，但是正如许多心理学研究的那样它对人类的影响也大相径庭。在满世界都在宣扬自我提升和自我激励的当下，掌握较少社会资源的一类人想要发光发亮，其难度不容小觑。在一个成功倚仗背景和运气的世界，活成一个自励的人也基本无望。当整个社会都在不断追求极速成功，这种不切实际的追求往往导致人们产生沮丧感和不安全感。失败的代价由个人来承担。正如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娜·沙尔夫(Christina Scharff)所言：“新自由主义的内心世界”毁坏的不仅是社会而且是人类的个性。它抹杀了独立的文化，而更倾向于消费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文化——加重焦虑以及削弱社会凝聚力。简而言之，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在过去的45年间，自杀率上升了60%。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所指出的，在年龄在15至44岁的男性和女性中，自杀是导致死亡的三大原因之一。新自由主义理论极富诱惑力，但是在不平等的社会里，对人尤其是年轻人造成了严重影响。

当今时代，贫困人口数据惨不忍睹。首先，每天都有22000个孩童死于贫穷。每十秒钟，就会有一个孩子饿死。世界有一半人口每天开支不到2.5美元。很多国家的家庭负债率都在急剧上升，这意味着中产阶级进入到了一个负债驱动消费的模式。这项数据折射了不幸的社会现实：从社会劳动中剥削的全球财富被一小撮人瓜分。大部分人的悲惨处境的改善是断断续续、很不充分的。

想要了解这个充斥着贫民窟的世界，那么我们就得先了解此前社会科学家绝口不提的一类词汇，比如耻辱、沮丧、孤寂、疏离以及愤怒。各国政府非但没有打压税收罢工，还费尽心机通过巧妙手段(比如扫毒、反恐的战争)来引导群众，还通过发明新词汇(比如安全、监督、风险规避、敏感度分析以及危险)来说明这类新型管控机制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的 2016 年报告显示, 每年武力总支出大概在 13.6 万亿美元, 其中的一半 (6.6 万亿美元) 用于军费开支, 四分之一 (3.5 万亿美元) 用于保障国内安全。武力总支出占到了世界 GDP 的 13.3%。官方承诺的正式发展援助资金只占了 GDP 的 0.7%。援助资金以及武力支出之间的差距和矛盾表明市场已经失灵。新自由主义政策作为国家政策, 本质上, 社会层面上导致饥饿, 军事层面上滥用无度, 对于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大多数国家人民日益加深的绝望感来说, 它是束手无策的。枪炮能恐吓人民, 却无法给他们美好未来的希望。

新法西斯主义



我只是不想要一个穷人。

唐纳德·特朗普



持续关注特朗普是人的自然本能。在一众铁腕人物面前论争强好辩, 特朗普当属第一。从菲律宾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 (Rodrigo Duterte), 到印度的纳

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再到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ip Tayyip Erdogan), 无不在特朗普面前“黯然失色”。这些人当中, 特朗普掌控着全球最强大的国家, 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游走于国际财政和外交机构之间。

特朗普以及欧洲新法西斯主义者, 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对静默而又婉转含蓄。他们并不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 因为他们始终拥护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 也始终坚持削减社会薪资的政策。对于全球化的批判并不在政策层面只停留在演讲或是政治层面。在选区的拉票演讲中, 特朗普和新法西斯主义者摆出姿态顺应坚持经济主权原则的政策。他们抱怨失业, 不满贸易政策, 但是和新自由主义一样, 他们除了全球化, 没有其它的选择。他们面临的社会现实矛盾是: 支撑财政结构的跨国公司攫取巨额利益; 然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口仍然生活凄惨, 他们生产出的社会价值却终究不属于他们。

新法西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截然相反。新自由主义的文化氛围滋生出这样一种态度: 成功是一趟个人旅途以及个人引导驱动人们追求卓越以及财富。这是美国小说家、哲学家艾茵·兰德 (Ayn Rand) 的小说《源泉》(Fountainhead (1943)) 中塑造的霍华德洛克 (Howard Roark) 这一角色所持的态度, 即应该远离“二手货们”, 从而让有才能且有动力的人(包括他自己)能够胜出。但是在那些不能够“胜出”, 不能够“成功”以及不能够满足自己基本欲望的人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失败不是自身的失败, 也不能够用体制的概念来解释。失败的原因是替罪羊们, 不是社会体制下人类自身的限制或是社会进步道路中的重重障碍。依照艾茵·兰德原则, 失败者小心翼翼寻找可以责备的对象。正如一个世纪以前恩斯特·布洛赫 (Ernst Bloch) 所写的那样——一个“骗取履行义务”(“swindle of fulfilment”)——错误的、粗鲁的社区替代一个真正充满人道主义的社区。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是将“失败”归责于个人, 那么新法西斯主义就是归责于替罪羊。

相比围绕国家或工人阶级构建经济主权, 新法西斯主义者的承诺更无力。他们言语间闪烁着经济民族主义等词, 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政策停留在了文化民族主义的边缘。他们幻想实现文化同质化——没有尖塔和头巾的欧洲, 没有穆斯林的印度, 没有墨西哥人的美国。反移民情绪是他们的民族主义的基台。贸易不再遵守交易的原则而是基于种族主义。这里很少有人会谈及在科技的驱动下, 西方生产率的提高是失业的根源。贸易对“白领”工作大量流失产生

的影响微乎其微。严肃的经济讨论被搁置一边, 消除痛苦的良方被“建墙”、“禁止穆斯林”、“禁止牛肉”以及打击“毒品贩子、强盗以及无所事事的人”所堵住。这些标语对于那些受此伤害的人来说意味重大, 但是对于那些经济上缺乏保障的人来说没什么意义。这是新法西斯主义的残酷之处, 也是这个时代盛行的一种政治形式。

艾茵·兰德的追随者相信他们已经取得成功, 华尔街、金融广场、达拉勒大街 (Dalal Street) 以及伦敦市呈现一片繁荣, 给人感觉持续减税以及释放出的活力让金融世界创造出了更多财富。特朗普政府的税收“改革”反映对艾茵·兰德的追随者而不是被剥夺财产的群众的偏袒。有钱人对新法西斯主义欣然接受, 虽然会对文化的猥亵感到一丝尴尬。税收罢工仍然神圣不可侵犯。投资罢工也是如此。这两种罢工从未受到新法西斯主义者“民族主义”的威胁, 相反, 新法西斯主义者对抗的是弱势者而不是有产者。

新法西斯主义者并没有被迫来掩盖他们的好战行为, 将“人道干涉主义”或是“保障”隐藏背后。他们坚信暴力的作用, 想要使用对抗疗法来维持他们的统治, 再殖民的呼吁和掠夺自然资源的呼吁犹如孪生兄弟, 结伴而来。他们发动战争——无论内战或是外战, 目的是防范文化主权幻想的破灭。他们无法创造一个文化同质化的世界, 所以他们使用武力恐吓他们眼中的“外国人”、“局外人”和“劣等人”。

帝国主义



当帝国主义走向衰落时, 他们就会诉诸暴力。

乌戈·查韦斯



无论新自由主义, 还是新法西斯主义, 都不能够推动解决和应对全球化造成的矛盾。由于社会上出现了封闭式社区凌驾于社会之上, 普通人成为可被随意抛弃的群体。这就是我们即将走向的悲惨世界。

亟须直接指出, 这种新的生产架构通过外交、法律勒索以及军事恐吓手段维持。当部分国家就偏向大部分全球北方跨国公司的制度设置的立场不一致, 以及如果出台的政策遏制有产者, 公司媒体和北方军事基地将被全力动员起来。从委内瑞拉到伊朗再到朝鲜, 这些国家所受到的压力正是帝国主义的例证, 即在超垄断军事资本主义时代下国家使用的超经济力量。

在我们当前这个时期, 美国政府已然世界帝国主义架构下的主要警察。已经通过合纵连横, 构架起一张盟友网络覆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员国, 向外延伸至重要的地区盟国, 比如沙特阿拉伯、印度以及哥伦比亚。美国及它的欧洲盟国必须支撑起一个不可持续、充满矛盾的集合体。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不愿看到任何一个对手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 当今

1. 罗德里戈·杜特尔特 (Rodrigo Duterte), 菲律宾政治家, 现任菲律宾总统。1945年3月生于菲律宾莱特省马阿辛市, 律师出身, 曾在菲南部棉兰老岛最大城市达沃任市长25年。
2. 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出生于印度古吉拉特邦瓦德纳加尔, 印度政治家, 第14任印度总理。
3. 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ip Tayyip Erdogan), 土耳其共和国第12任总统 (现任)、正义与发展党主席, 土耳其第25任总理, 土耳其政治家。

4. 《源泉》记述的是一名建筑师的霍华德·洛克, 与强有力的竞争者彼得·吉丁和报纸专栏作家托黑的斗争经过。此外本书还传达了大量的时代主题: 个人主义的力量, 法西斯主义的威胁, 善行与邪恶的较量。这些思想观念的冲突, 与兰德著作中令人震惊的表达一起, 构成了这本书持续的影响力。
5. 《源泉》书中的“二手货”的特点是缺乏自我和创新能力, 在行为上模仿、依附和寄生于他人。
6. 恩斯特布洛赫 (Ernst Bloch), 1885年7月8日出生于德国路德维希港, 1977年8月4日逝世于德国杜宾根, 青年时代曾攻读哲学、物理学和音乐史, 而后作为自由作家活跃在慕尼黑、伯尔尼、柏林等地。1933年流亡捷克斯洛伐克, 1938年流亡美国。1949—1957年任前东德莱比锡大学哲学教授, 1961年移居西德, 受聘杜宾根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

时代，真正能称得上是美国对手的主要是中国和俄罗斯。世界经济论坛预测 2017 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GDP 达 18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体量的 24% 以上)，中国紧随其后 (11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14.8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表明 2016 年中国经济增长 6.7%，然而美国只有 1.6%，经济增长相对较缓慢。普华永道 (PricewaterhouseCooper) 称，到 2050 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换言之，中国正蓄势待发，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此外，中国的经济活力不再依靠廉价劳动力，而是科技驱动的生产力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16 年的报告称，在 2015 年度，中国的专利申请量世界第一，是美国的两倍。事实上，2015 年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中国将要挑战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于知识产权驱动下的公平外包积累策略的主宰。

如果这些敌手——中国以及俄罗斯开始成为强大的一极，那么他们将会挑战对西方有利的脱节生产以及全球资本积累体系中的三大支柱：公平外包、知识产权以及西方国家使用武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有些微小的迹象显示这三个支柱确实受到了挑战。前两个被逐渐削弱，虽然将花上数十载才能够将它完全搁置一旁。第三个支柱——对于武力的垄断将很难撼动。2016 年，美国军事支出超过了以下八大高军费开支国 (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印度、法国、英国、日本以及德国)。美国在军费上的开支达到了 6112 亿美元，相比之下，第二大军费支出国——中国的军费支出只有 2157 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增加美国军费预算，增加的部分也超出了第三大军费支出国——俄罗斯的军费总支出，即 692 亿美元。美国的军事足迹遍布全球，在七十多个国家共分布有八百多个军事基地。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加起来也只有三十个海外基地。中国只有一个海外的基地，即在吉布提 (Djibouti)，紧邻美国大型军事基地。俄罗斯的军事基地主要在前苏联国家 (主要在中亚)，有两个基地在亚洲的边缘地带 (叙利亚和越南)。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大国——中国以及俄罗斯能够在任何方面挑战美国的军事霸权。他们最多会阻止美国采取政权变更行动等攻击行为，比如在叙利亚的行动。

虽然他们军事实力不强，但是这些国家并不是轻易就能被制服的。给他们施加太多的压力会使他们向内发展或者在西方的框架范围以外建立和积累自己的网络。中国已经通过丝绸之路项目、在非洲的投资以及自身的知识产权的发展，正在建立一个生产和积累的架构，逐渐削弱对西方国家公司有利的脱节的生产过程。如果对中国以及俄罗斯施加太多的推力，中国将慢慢地退出西方银行体系，将盈余存放在其它地方，脱离对西方销售市场的依赖。一边要压制敌手，一边要确保他们继续围绕西方的轨道运转，同时做到这两点是当今帝国主义要完成的一项复杂任务。

动用武力，无非是争经济之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下称“北约”) 东扩至俄罗斯，以及围包中国无不体现这一点。乌克兰以及朝鲜爆发的激烈冲突以及中国南海地区的冷战是衡量这些斗争的尺子。俄罗斯以及中国都不愿意将经济优势拱手让于西方国家。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它的眼中钉肉中刺。惹得美国不悦的是中国的贸易顺差。相比日本，中国的行为具有指导意义。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及 90 年代，日本的贸易顺差同样也困扰着美国。日本政府两次允许美国施加政治压力来让日元升值，让利美元 (1985 年签订《广场协议》以及 1995 年签订《反向广场协议》)。2010 年，日本人民选举出一个改革型政府，其被委以撤离美国在冲绳的基地的任务，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 直接插手要求日本时任首相鸠山由纪夫下台。美国要求中国对人民币重新估价，并且意欲插手中国政治，这并非易事。所以在中国海上航线问题上挑事，利用军事基地以及飞越中国领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任务，成为当务之急。北约东扩进程中，武力恫吓屡见不鲜，打破苏维埃和德国签订的协议接受联邦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德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 (Hans-Dietrich Genscher) 告诉苏维埃共和国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 (Eduard Shevardnadze) “我们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身份会给统一的德国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对于我们，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会向东扩张”。但事实上，北约东扩了，而且东扩过程中使用了具有攻击性的导弹防卫，直接威胁到

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乌克兰危机就是北约向东欧扩张导致的。北约向东欧扩张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俄罗斯周边国家而是确保这些国家仍然处在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范围内，而不会落到俄罗斯或是中国手中。他们的武力是掩藏在全球化温柔面纱下的铁拳统治。

虽然世界仍处于金融危机当中，藏在门背后的世界主宰者——七国集团 (G7 国家) 继续实施他们的诡计。受七国集团影响，在国际机构中，政策空间受限，七国集团在补贴上享有有自由度，但南方国家享受不到同等自由。其中一例就是施加压力反对南方国家提出的保障粮食安全的要求。另外一例是美国、欧盟以及他们的“真正之友” (奇怪的专门用语，指美国和欧盟命名的美欧政治集团) 推动签订的《国际服务贸易协定》 (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TISA)。TISA 协定中“真正之友”团体指的是高收入国家，其中只有两个是低收入国家 (巴基斯坦和巴拉圭)。TISA 促进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以及数据获取地境外大型企业对于该数据的控制。TISA 议程的要点是搁置原开发项目，实施并落实“电子商务”策略，消贫减贫。UBS 报告称电子商务议程不但没有终结贫穷，反而加剧了贫穷。银行分析师称，随着电商的发展，南方国家“将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威胁，高度自动化淘汰很多技术含量低的工作，但是没有足够科技的能力来获取通过高度网络化再分配的利益”。这意味着电子殖民将使一些公司，比如脸书 (Facebook)、亚马逊 (Amazon)、网飞公司 (Netflix) 以及谷歌 (Google) (FANGs)，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服务，从中获得数据并取得效益，让资本受益，但是对于劳动力以及社会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除了 TISA，西方国家在欧亚大陆推动贸易制度：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 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无论是 TTIP 还是 TPP，都极力将各个国家拉拢到西方贸易霸权网络中，阻止小国家进入中国和俄罗斯的辐射网络。这两份协议都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商讨的，若非偶然透露，所有商讨

内容将不会对外公布。在 TTIP 和 TPP 面前，国内法都将被搁置一旁。根据协定内容，北方国家将会为其它“伙伴”设置议程。其中一份被泄漏出来的文件说，美国正在向其他国家施加“巨大压力”来解决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意见分歧在关于投资的争论中，其中一份文件显示“美国在这个提案上不会有任何让步”。这些“协商”的结果就是西方国家取得绝对胜利。西方国家一如既往施加巨大压力。西方国家制定的规则仍然使南方国家的经济体屈从于西方国家的势力。南方国家将继续屈服于西方国家制定的、有利于西方利益的一套规则。任何一项贸易规定，只要是会削弱有利于西方大型垄断寻租公司的知识产权制度，都会被西方国家领导层所直接否决。这实质上就是帝国主义压力在贸易商讨上的体现。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退出 TPP 的行政命令。如果将特朗普退出 TPP 视作方向的改变就是大大的错觉。美国退出 TPP 针对的其实不是贸易规则本身而是中国，而且不只是中国，还有任何一个有可能重新改写贸易规则以及创造全球生产和积累网络的国家。2015 年 10 月 5 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说道“我们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国际经济的规则”。TPP 不是问题的关键。这是孤立中国以及为了防止对手国家来书写国际秩序的规则。特朗普措辞严厉，定下了基本基调，但是说的是同一件事情。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以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绝对不能参与“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这便是帝国主义的本色。帝国主义必须制定规则。

新时代帝国主义手持两把斧头。首先，在制度的前沿，北方国家推动创建一系列国际组织，比如 WTO，是讨论贸易和发展问题的唯一论坛。同时，北方国家操纵旧的国家组织，比如联合国，听从其武力使用方面的决议。第二，在意识形态阵线，北方国家反对任何一个政策替代新自由主义政策。私人机构主导的维护私人机构的利益的发展被视为唯一的发展逻辑路径。这是新帝国主义，所谓的遵循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全球化机构，即使新法西斯主义者对他们的文化遭到威胁埋怨不休。

7. 经济民族主义 (economic nationalism) 是一种在发展阶段上各个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即一个民族在完成自己取得独立的历史任务后，必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才能使自己真正地站起来。类似于重商主义，指通过政府政策的形式对进口商品建立贸易壁垒，并施加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政策以保护其国内产业。
8. 文化民族主义 (cultural nationalism) 是为维护或重建本民族文化而产生的各种思想、态度和行为。
9. 文化同质化 (cultural homogeneity) 是指世界各地的文化，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国际交流中相互模仿和融合，以至逐渐趋同的现象。

10. 乌戈·查韦斯 (Hugo Chávez, 1954 年 7 月 28 日——2013 年 3 月 5 日)，委内瑞拉政治家，曾任第 52 任委内瑞拉总统并创建“第五共和国运动”党，1998 年 12 月当选总统。2007 年成功连任。
11. 吉布提 (Djibouti) 位于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
12. 国际服务贸易协定 (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 TISA) 简称服务贸易协定，是由少数 WTO 会员国组成的次级团体 WTO 服务业真正之友集团 (Real Good Friends of Services, RGF) 展开的，致力于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贸易协定。

到了二十一世纪,在国家间层面出现了首个对新帝国主义的主要威胁。2003年,在坎昆举办的WTO会议上,新兴国家阻挡了全球北方关于知识产权的议程,美国企图在伊拉克扩大军事行动,联合国的很多国家对美国的这一企图提出了质疑。这两个态势的发展给金砖国家项目(BRICS,巴西、俄罗斯、中国、印度、南非)的成立提供了基础。早期的金砖国家集团是什么样的?它最初不是一个反帝平台。反帝国主义的平台会要求金砖国家集团在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层面采取帝国主义。金砖国家集团只是从制度上挑战世界“单极”格局,是为形成世界多极化格局而进行的大国结盟。

显然金砖国家集团已经企图建立一个新的机制基础来制衡全球北方——新发展银行来对抗世界银行;筹备应急储备基金(Contingency Reserve Arrangement)来对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争取BRICS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永久席位。有人谈论建立南方评级机构对抗惠誉国际(Fitch),穆迪公司(Moody's)和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的霸权。也有人谈论用其它的货币作为国家间贸易币种。有一种不太可信的说法是,金砖国家已经开始讨论要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架构。

金砖国家集团,鉴于其统治阶层的本质(尤其是巴西以及印度右翼势力具有统治地位),除了帝国主义,他们没有选择意识形态的余地。金砖国家采取的国内政策可以被形容为具有南方国家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它侧重商品销售、给工人很少的工资,因为北方国家实现回收利用的剩余物资的转化,即使他们自己国民生计受到了威胁,即使已经在其它国家(一般是小国,曾是第三世界集团的成员国,)开拓了新的市场。金砖国家内部很少会讨论维护粮食主权或粮食权,也很少会讨论创造优质工作,反对大量堆积的财富,以及打击银行家的权势。事实上,金砖国家新设立的机构会被强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元货币捆绑在一起——它们不愿意搭建一个新的贸易与发展平台,脱离北方国家的运行秩序。应急储备基金进行贷款评估,将继续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协议。美元在这些机构中无处不在。渴望征服西方国家市场的思想仍然主导着金砖国家的发展议程。金砖国家自身人口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并不能驱动他们的政策走向。

最终,金砖国家项目无力撼动美国以及北约的军事统治地位。当联合国投票决定允许“成员国使用所有必要的措施”,类似通过关于利比亚问题的第1973号决议,实质上就是发给北约国家可使用军事武器的全权委托书。除了有能力遵守联合国决议的国家外,别无选择。2014年俄罗斯武力干涉克里米亚并于2015年入侵叙利亚。这意味着美国的军事单极霸权地位将会被逐渐削弱,但尚未结束。美国势力遍及世界各个大陆,可打击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地区性和平冲突解决机制将会被北约的全球影响力以及美国的战争机器削弱。强大的军事力量将会转化成政治力量。面对这股力量,此次金砖国家束手无策。

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和中国在安全以及经济上的结盟并不代表要建立一个取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新一极”。它们只是反抗帝国主义入侵,被制裁的俄罗斯在与中国的顺差中寻找庇护并且俄罗斯的自信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的警惕性。2017年,美国和朝鲜处于对峙局面,中俄的联合海军演习以及俄罗斯军队在中国的支持下进入西亚,表明它们不允许1991年至今美国的完全主导。它们争取的是保护主权完整以及领土周边的区域影响力——而不是对抗美国帝国主义的全球竞争。

我们面临的并不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而是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金砖国家——主要是中国,在全球争取市场份额,并推翻一个已衰弱的西方经济集团。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政策与依赖20世纪90年代之后进入资本主义轨道的大量劳动力的政治经济秩序之间的冲突,使得资本主义之间的危机呈现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危机。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幻想至少要回溯到十年前,那时中国(以及其它国家)的贸易顺差,挽救西方国家免于金融秩序崩塌的境地。但是那些幻想从未将口头承诺落实到

实际政策层面。现在的危险是新出的政策可能会搅乱现行体系。中国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坦言:“打贸易战,没有赢家”。他指的不仅仅是贸易战,而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冲突带来的一系列结果。当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加剧了国家之间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时,这种冲突不容低估。

帝国主义继续构筑世界秩序——但是它不再是原始的殖民主义或是20世纪的新殖民主义。当今时代形势更为复杂。以下是21世纪帝国主义的6大特点。

(1) 维持联盟体系。以美国为轴心国,以其次级盟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以及其它国家)为同盟国。在同盟国的外围是从属盟国,比如哥伦比亚、印度、以色列以及沙特阿拉伯。这些盟国对于美国军事的全球影响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盟国的挑战将会立马被美国军事全力扳倒,大西洋国家的军事设备、军事训练将会对从属盟国开放。

(2) 确保联盟体系不会受到任何挑战。冷战的终结标志着对联盟的主要威胁(苏维埃联盟及其盟国)消失。在那之后,美国及其同盟国已经确定排除对既定体系构成挑战的任何因素。随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张到东欧以及美国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增长,中国以及俄罗斯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不管是通过传统政变方式(参考洪都拉斯)还是通过后现代政变(参考巴西)方式,新抬头的南美势力必须被打压。若BRICS、ALBA或任何一个组织想要追寻其他军事基地,这些组织必须被分解。

(3) 确保美国始终保持高度自信。在1990年至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说道,我们摆脱了“越南综合症”。美国现在重拾自信,又在世界舞台扮演主要角色——不惧施展所有力量。20世纪80年代的代理人战争可以搁置一旁。现在美国可以采取全方位主导战略抵抗敌对国家。2003年,美国向伊拉克发起进攻后,“美国新世纪”的呼声高扬。有人担心,伊拉克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将会加大对于美国实力的

质疑,这个质疑必须要打破。重要的是重新恢复美国“天下无敌”的形象——是同侪之首,也是美国国务卿玛德琳·奥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口中的“必不可少的强者”。对伊朗以及朝鲜施加的威胁正好体现此类狂妄言论。

(4) 保护全球商品链——这是工业生产的基础,产生的好处被北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所获取。分散的生产基地(工厂遍布各个国家)以及严苛的知识产权法使得在这条全球商品链条上的公司比工人组织和国家拥有更多的权力。北方国家联盟体系的外交以及军事实力被用来抵抗国有化政策以及知识公域。劳务分包机制让北方国家维持着很高的道德标准,然而他们自身完全依靠的是严酷的工作环境,这也使得社会关系进一步恶化。

(5) 确保原材料从矿井以及水井中挖掘之后的安全运输费用远低于支付给原材料拥有者的费用。有害环境且非人道的开采行为在森林和沙漠深处不断上演,借以反恐战役、反毒战役或其它类似的名义,镇压反抗者,使开采合理化。北方国家的附属合作伙伴以及新兴国家都依赖出口原材料来实现他们的发展目标这给了北方国家机会暗中(直接控制范围之外)洗去那双手沾满的污秽。

(6) 保障北方国家的财政实力,无论是通过保护沙特阿拉伯的皇室家族,为北方国家的银行获取石油美元的资金流或是通过确保贫穷国家全部还清债务。当金融危机袭击环大西洋国家,北方国家请求亚洲大国(中国、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提供流动资金。作为交换,北方国家答应关闭其执行机构——七国集团(G7),并以二十国集团(G20)取而代之。在银行恢复之后,承诺就被忘之脑后了。必须恢复财政实力,这是底线。

来自金砖国家的挑战现在很大程度被压制了。这与它内部矛盾有很大的关系,并与巴西和印度以及南非的右倾权力上升,和击中金砖国家经济力量中心的商品降价有关系。至少现在金砖国家已经无法重新平衡世界秩序。它需要依靠它的两个成员国——俄罗

13.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石墨烯,基因,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以及生物技术为技术突破口的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基于网络物理系统的出现。网络物理系统将通信的数字技术与软件、传感器和纳米技术相结合。与此同时,生物、物理和数字技术的融合将改变我们今天所知的世界。

14.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即美欧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议题涉及服务贸易、政府采购、原产地规则、技术性贸易壁垒、农业、海关和贸易便利化等。

15.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重要的国际多边经济谈判组织,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是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原名亚太自由贸易区,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

16. 坎昆(Cancun)是墨西哥著名国际旅游城市,位于加勒比海北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东北端。

17. 2014年7月15日,金砖五国在巴西福塔莱萨签署协议成立新发展银行。

18. 应急储备基金是金砖国家(BRICS)领导人达成的协议之一,资金来源于各国央行储备,用以防范各国短期资金流动压力,加强全球金融稳定。

19. “越南综合症”一词大概由尼克松提出,后来由里根使其广为流行。“越南综合症”笼统而言常被倾向越战和类似国际干涉的人用在反对派身上,以此来形容反对或批评越战或类似越战危险的观点立场是一种疾病。

斯和中国来适度挑战西方帝国主义。在欧亚大陆两翼受到美国军事操控挤压、西方对于伊朗以及朝鲜的威胁以及俄罗斯由于入侵克里米亚而受到制裁，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签署了经济和商业协议以及军事和战略协约。经济以及商业纽带——尤其是能源销售协议，依然保持不紧不松。中国和俄罗斯在朝鲜海湾下的联合军事演习以及中国战舰驶入地中海靠近俄罗斯轮船，意味着他们将不会轻易允许西方使用武力来塑造一个为他们所用的世界。但是，这些演习活动表明防御的姿态，不足以重新平衡社会秩序，更不用说建立一套新的秩序。在新法西斯时期，他们能否一直维持他们的防御性行动，这个很难说：俄罗斯和中国的飞机会降落在德黑兰和平壤来阻止欧亚大陆边境国家的政权变更吗？

第二部分：动力

历史的分解



你的坦克是一辆强劲的车辆。
它可以摧毁树林，可以击垮上百人
但是它有一个缺陷：它需要一位司机。

贝尔托·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 《初识德国战争》



我们面前是什么？纵观宇宙，伟大的人类运动数不胜数——劳动斗争以及尊严斗争、为了保护自然资源的权益而斗争以及为了保护自身的权益而斗争。这些是对抗强大势力的主要途径。

一百年来，工厂以及办公室圈入了数量庞大的工人，令他们在监视之下劳作。资本家渴求得到利润，也看到了建立大型工厂和办公室的好处。生产的规模使得资本受惠——通过制造大量的商品，资本能

够降低原材料的价格，通过走量让市场饱和。小公司被淘汰出局。手工艺慢慢消失，工人们必须在生产线上永不停歇地工作，他们把他们的精力花在了越来越细小的工作上，最后成为了商品，但这一过程并不受到他们的控制。没有一个工人是制作整件商品的，而是所有的工人联合起来制造一件完整的商品。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1867年)中所说，人成为了“商品的附庸”。正如手艺人所看到的，他们的技艺被组装线以及机器所取代的，这也意味着对工人们的需求也下降了。工人们的生活依附于工厂，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人阶级发现他们“被巨型资本的车轮碾过”。

资本的优势立即转化成了它的劣势。很多工人被安排在一个工厂内劳作，这使得工人之间可以经常交谈。他们将会互相谈论自己的问题，如何理解尊严的崩塌。正是在这些交谈以及行动中，现代工会运动发展了起来。工厂是行动的中心，因为大批工人们在此聚集。资本也存在陷阱——资金已经被投入到生产中，任何一秒钟的浪费都将会给老板造成损失。这意味着如果工人们选择罢工他们就可以给资本施加压力。在这一期间，比如在大不列颠，工人们并不受雇于工厂；他们从事家庭工作。但是家庭工作人员没有在工厂聚集的优势，不像在工厂，工人们组织起来罢工能够给资本施加压力。如果一个家庭工人起义反抗，下场就是会被解雇。但在工厂，解雇整个工厂的工人是很难的。这也是为什么工厂成为了工会运动的中心。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者视工会为社会主义未来的中心。这也显示了工会运动的性别歧视如何在工业联合主义策略中得到再现：大部分工人阶级很难组织起来，因为他们分散在了各个有产者的家庭内部，处于工人组织领导权之外。

到 20 世纪中期，工会运动发生一百年之后，资本转向新的剥削方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进入到了生产脱节的时代。小工厂不再像大工厂一样工人密集。如果一件商品建立跨国生产线上，那么它有利于资本，不利于国家——因为他们只能够将生产链的一部分进行国有化，政府难以将整个工厂国有化。商品链让国有化无处遁形。生产的脱节使得工会化很难实现，因为资本家会说如果你在一家工厂罢工，那

么他们就关闭这家工厂，将生产场地迁到别处。他们的投资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困。由于大量的生产工作被外包给边远地区的小资本家，垄断公司觉得放弃一家供应商而选择另外一个国家的供应商，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他们对于供应商的忠诚度为零。换言之，新的生产技术已经使得工会处于不利地位。也正是在这些新建的、分散小工厂，女性员工成为了非常关键的实体存在——她们不到十岁就来到这里，不断加速的车间机器耗尽了她们精力，随后又被送回她们生活的农村——这些女性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废弃之物。

工人们四处游走，寻找并没有什么保障的工作。工作时间被延长了，业余时间可能有，但是被严重压缩了，同时也就没有时间来建立工人阶级以及农民的庇护。加上通勤时间，用于社区以及工会的时间也被偷走了。人们每天生活在焦虑紧张中，时间被偷走了，而偷走时间的不仅仅是雇佣者，还有不安全的社会结构以及兼职工作。花在找工作上的时间常常超过工作本身时间。

此外，工会文化受到商品文化的冲击。人民受到来自媒体、广告行业以及教育机构的冲击，从工人转变成了消费者。也就是说，被新自由主义精神生活弄得疲惫不堪的新身份并不和工作地点有关，而是与消费模式相关。商场以及广告吸引到了各阶级的人，他们将自己想象成消费者。除了商场，还有宗教活动场所——寺院、清真寺、教堂——已经成为流离失所的非正式工人的避雨港湾。他们被社会拷打的身体和精神在不同信仰的传教士的救世诺言中得到救赎。拉丁美洲的五旬节派、中国的基督教徒等等顽强地想要在工会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有一席之地。社区创立是源于对于商品的渴望以及信仰。在很多地方，这些比工会文化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更加吸引人。

在这个背景下，工会主义便被视作是不合时宜的。主流思潮视之为昨日文化，它的标语让人怀想起没有商场也没有广告的年代。不仅如此，甚至更普遍的集体情绪，如民族和爱国精神也已经被侵蚀了。它们仅

20. 代理人战争是两个国家不直接参加的战争，两个对立的力量利用外部冲突以某种方式打击另一方的利益或是领地。通常包含国家打击对立国家的盟友和帮助自己的盟友打击敌人。
21. 石油美元是主要石油输出国自 1973 年石油大幅度提价以来，历年国际收支顺差所积累的石油盈余资金，因美元所占比重最大，故称石油美元。
22. 七国集团 (G7) 是主要工业国家会晤和讨论政策的论坛，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
23. 二十国集团 (G20) 由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于 1999 年倡议成立，由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以及欧盟 20 方组成。

1. 贝尔托·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 1898 年 2 月 10 日——1956 年 8 月 14 日)，是一位著名的德国戏剧家与诗人。1898 年 2 月 10 日，贝尔托·布莱希特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奥格斯堡镇。

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而不具备有意义的文化属性。一个人没有对人民尽到任何责任的人就敢宣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分明人民才是组成国家的根本。锋利的民族主义刀刃对准异见者而发生剧烈摩擦。迫切地煽动叛乱已经成为了工作重点。学生、记者、工人、农民、妇女——任何一个人如果称国家“共识”有问题，那么就会被视为这个国家的异类。被接受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可憎的、未加思考的社会凝聚形式，它不要求建设社会，而是建立在暴力和反社会活动的基础之上。

结构性失业以及扩大的非正式部门将不满情绪从工作场所带到大街小巷。生存压力迫使人们在大街上从事非法活动——毒品交易、性交易、武器销售，甚至开始物物交换。这些活动的存在使得国家有机会打击这部分人民。国家的职能更多的是维护安全而不是为人民谋福利，是对民众的管制而不是维护人民的利益。那些支持小国家（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不会与一个为了维护安全而扩张的国家机器发生冲突。精英们十分清楚绝望和革命之间的关系。美洲银行首席执行官汤姆·克劳森 (Tom Clausen) 就是其中一例，“人们绝望之极，就会爆发革命。出于我们的自身利益，要确保他们不会被迫地进行革命。你必须让病人活着，否则你不能够实施治疗”。为了防止其演变成革命，摆在精英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采取妥协的态度，防止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最坏的结果（这是自由主义的特征），二是采取严厉的安全措施，镇压反抗（这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征）。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的时代只有一条路可走，因为新自由主义以及新法西斯主义有个共同点，即派遣治暴警察平息暴乱。“自由贸易”的力量与“人道主义干预”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覆盖全球的全球货物链与分裂国家、制造动乱的政变战争之间的差距也在缩小。马克思在 1867 年写道，武力“自身就是一股经济力量”。

历史的重构



他们害怕我们，因为我们不惧他们。

Berta Cáceres.

贝尔塔·卡塞雷斯



如今，我们面临着生产脱节、消费主义文化以及安全国家的兴起，左翼运动做了些什么？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回答，但是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果工人文化不复兴，工会的力量将无法完全恢复。如果不认识到生产脱节以及在工人居住的地方建立工人力量的必要性（因为并不是总能够在工人工作的地方组织起工人力量），那么就很难复兴工会的力量。建立工人力量是关键所在，而不仅仅是建立工厂力量。伟大的社会及经济变革在我们的双脚下触即发，这将激起工人的沮丧以及愤怒之情。当变革的浪潮掀起，客观的沮丧情绪将导致主观反抗的爆发，工会以及各党派是工人的哨兵，应该为此做好准备。因此重新构建工人阶级以及农民阶级至关重要。

工会主义的愿景是建立工人力量。建立工人力量不仅仅意味着在工作地、尤其是工厂以及田地建立工会。毫无疑问，组织工人建立工会仍然很重要。但是在很多部门遇到的问题，尤其是在出口加工区的小型生产机构以及居家企业中遇到的问题，意味着必须采用新方式来组织工人。比如，全球一些最激

烈的组织工作发生在工人生活的地方，他们为了生存而抗争，抵制水资源等重要物资的价格上涨，也为家人争取安全空间而抗争。这些就水资源和公共空间的斗争已经激励工人农民行动起来，他们已被普及了“社区”和“邻里”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在表面上没有阶级的隐含意义但是当有人从实利主义观点来看的话，就会看出阶级的概念。毕竟，由工会主义者组织的科恰班巴（玻利维亚）工人在“水域战争”中保护的“社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工人集体。这些工人的生活因私有化而分崩离析。他们知道社区在他们的生活中是一个切切实实的存在，他们需要团结起来来抵制水域私有化，他们也需要紧紧地握住社区这根社会纽带，并在后面长期斗争中重建利于生存的社区。

南非的社会机构棚户区居民 (Abahlali baseMjondolo，简称为 AbM，亦称为 Shack Dwellers)、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 (MST 或是 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 以及印度的两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型组织——印度民主青年联合会 (Democratic Youth Federation of India, 缩写为 DYFI) 和全印度民主妇女协会 (All India Democratic Women's Association, 缩写为 AIDWA) 的经验表明了工农居住地区建立工农力量的有效性。在这个时代，工农阶级大多居住在贫民窟。这些地区人口拥挤，国家扶持力度薄弱。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UN-Habitat, 也称“联合国人居署”) 估计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生活在贫民窟。在全球南方的一些城市中，半数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在那里没有足够的住所，缺乏干净的水源，卫生条件堪忧，医疗以及教育设施缺乏或不足。国际机构的数据看起来比实际要少。比如，开普敦（南非）的卡雅丽沙贫民窟 (Khayelitsha) 据说有 40 万居民，但是在贫民窟工作的人说实际人口至少是这个数字的三倍。约 100 万到 150 万人口居住在孟买（印度）的达拉维 (Dharavi) 贫民窟，而墨西哥城的曲达德内扎（墨西哥）贫民窟则有 100 万人口。据说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是卡拉奇的沃兰奇镇（巴基斯坦），其居住人口超过 250 万人。这些贫民窟的居民大多在非正式领域工作——在一些国家中这部分

工人几乎占据了劳动力人口的全部（比如印度的非正式部门的工人占了劳动力人口的 90%）。这些工人阶级处于国家导向的劳动力政策的社会监管之外，也经常处在工会的网络之外。

社会财富不会流入这些地方。国家的优越性在这里也没有得到体现。结果是，这些地方的工人要依靠 (a) 他们个人的才智以及自我组织；(b) 地区帮派、宗教团体以及非政府组织建立的市场；(c) 工人中妇女群体的奉献精神，她们为了维护家庭的完整奋力抗争，为社会再生产投入加倍的心血。第一项实践表明了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合作组织以及自助团体的形成，这些组织由工人阶级建立，为工人阶级服务。第二项是最严峻的挑战，因为宗教组织以及黑手党把他们的触角延伸至工人阶级的生活之中。他们——以及非政府组织——是左翼力量成长的结构障碍。但是左翼人士知道仅仅通过正面挑战这些实体并不能够得到成长。广大全球南方的经验告诉我们左翼组织必须通过社会再生产的成果来证明它们确实优于宗教、慈善组织以及黑手党。左翼组织正在致力于创造平台来帮助工人阶级的抗争，让他们得以获取水、电、住房、街道服务、学校、医疗护理。并且左翼组织也在和这些工人阶级并肩作战，工人阶级也开始以自主形式来提供这些服务。这是一项危险的活动。它意味着要削弱地区帮派、宗教团体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势力——这项工作会触及他们的利益。与此同时，左翼组织在这些领域的介入使得主要由妇女进行的社会再生产的私人劳动开始社会化。在工农阶级中建立社会化再生产的制度还需要很多努力。知识分子们也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研究这些方案，撰写相关文章，在不同的场合分享这些方案，并交流吸收在人民群众中产生的宝贵经验以及成果。

此外，当代工人阶级力量的建立在有力地进行，并对由性别、宗教以及其它形式的等级制度和歧视带来的社会分裂进行抵制。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常担心区分社会等级可能会“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事实上，对社会等级的区分已经破坏了团结，而对于这些议题的进一步忽视只会加深不团结以及不信任。

2. 卡塞雷斯 (Berta Cáceres)：土著的兰卡族 (Lenca) 活动家和抵抗运动领袖。

工人及农民为尊严而做的抗争并不是在阶级政治之外。阶级政治的核心要义就是希望把我们从严迫剥削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再次成为完整的人。工人及农民们除非团结一心，否则将不能够强大起来。印度的1亿8千万工人在工会运动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在2016年9月开展了罢工运动，因为摆在台上的议题包括了社会分化的政治问题，也包括正式部门的工会化工人以及非正式部门的非工会化工人间的分化（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妇女，比如在公共健康以及早期孩童教育领域的妇女工作者）。这些工人的行动表明工农阶级建立的核心是对社会等级、宗派主义以及厌女症的抗争。

建立工人力量的一大限制是势力越来越强大的资产阶级主导的商品文化，它宣扬的是视人民为消费者。这种文化推力受到公司媒体以及广告的驱动，颠覆了历史以及集体主义的概念——历史沦为商品销售的象征，同时历史也从人民阶级的集体反抗变成了个人的侵入。这些概念深深地植入媒体以及学术话语中，在这些话语中人民行动对创造历史的重要性被广泛质疑，甚至人们普遍认为改革既不是可取的也不是可能的。这表明需要文化抗争来丰富左翼历史的沉淀来突出显示工人以及农民对世界做出的贡献。年轻人再也不以坚定的方式来了解左翼。向年轻人介绍左翼以及工人和农民的历史对于重建左翼力量极其重要，并不是无关紧要。支持左翼的知识分子需要与大众运动联结起来，共同助力推动这项议程。

换句话说，关于观点的争论对于有希望且可能的运动来说是一道中心战线。比如一个公司驱动的媒体在对其他国家狂轰滥炸，通过推行贸易政策破坏其他国家的农业对同时，却采用的事实观点宣扬一个善意的西方形象。美国军队杀害阿富汗或索马里平民的事件会被视作一次事故。但当一个被西方敌视的政府杀害平民的时候，这样的举动就会被视为这个国家或文明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西方驱动下的贸易政策最终毁坏马里的棉花种植，这会被视为自然法则必然结果。而当一个被西方敌视的国家在经济政策中犯错时，这会被视为一个失败模型的结果。掌控历史的言论是一个问题，但是控制媒体

对于现实的表述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个狭隘的、固化的公司驱动的媒体——无论是CNN国际（美国有线电视网络）或是环球电视台（Globo）都充斥着意识形态的框架，都认为西方驱动的政权变更战争是可接受的，西方驱动的贸易政策是必然的。重要的是要抵制这些媒体的制度性统治和意识形态框架，为解放信息的传播提供可替代的网络。

在人民的政治社会运动中，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任务是什么？在早期，会直接认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将会从运动中有所学习，看到运动中提议的选择，并把从这些运动中的获得的启示用于搭建未来成熟的理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不再是不证自明的。许多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由于很多的原因，远离了运动。其中原因不一而足：知识分子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媒体的知识分子和学者），运动的瓦解、对于主要变革不可能实现的观点的采纳、以及后现代时代坚定支持价值观的窘迫，这种价值观往往被视为无凭无据，易受影响的。但是世界上仍有数百万知识分子并不被这些发展所影响，而是继续和运动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继续在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一大任务是跨越国家的疆界，让这些知识分子们凝聚在一起，通过他们的成果，来鼓舞他人参与这些以实现解放为目标的，和社会政治运动紧密有关的项目。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的运动，我们会发现：他们想要把宏观经济政策置于民主的控制之下；他们想要提高社会薪资；他们想要建立基础设施来满足大众的需求；他们想要打破公司以及精英阶级的税收罢工；他们想要把银行从私人的机构转化为公共事业；他们想要为所有人提供一个有保障的生活以及为所有人提供住房。这些是构成未来的要素。该由知识分子来采纳这些观点并展开关于它们的辩论。重要的是我们要搭建一个知识分子的平台，从运动的经历中收获经验并为社会、文化、经济以及政治秩序助力。同样重要的是恢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腐化的两大观点，即关于人类以及未来的社会主义观点。

商品文化以及视人类为消费者的观念吮干了关于何为人观念。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者深入观测了他们的传统，并构建了一个词汇来谈论一个并没有被资本主义社会规范所控制的社会中人类的性格。美洲玻利瓦尔联盟（Bolivarian Alliance for the People of Our America, 简称 ALBA）的执行秘书大卫乔克万卡（David Choquehuanca）谈到“Qhapagñan”，即美好生活之路时，指出需要的并不是创造出“消费者以及所有者”，而是创造“iyambae”，即“一个没有主人的人”。正如乔克万卡所说，一个没有主人的人就是“未来，即人们寻求美好未来的道路”。重新唤起何为人观念——以及重新唤醒建立一个人类社区的需求的观念——需要莫大的努力。这些努力已经在大众运动中显现出来，这些大众运动竭力反对人类决策等同于复式记账的逻辑。

作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重要的是恢复“当下并非永恒、变革皆有可能”这一重要观点。这种变革的可能性在于对未来的理解。我们不会就过去和现在是否存在而争论。它们是不证自明的概念。但是关于未来会存有争论。我们知道明天会到来，后天会到来，下个月和明年都会到来。但是这只是有顺序的时间进程，即当下的外延。但这个不是关于未来的正确理解。如果对未来有一个常识性的认识，那么这种认识会被科技所掌控——是科技，而不是人们的性格定义了未来。我们幻想当代新的科技突破能够解决我们的社会危机——新的绿色科技使我们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新的数字以及纳米技术使我们不再经受经济停滞。科技决定论意味着横跨在数十亿人们梦想之上的问题并没有受到来自社会以及政治方面的阻碍。它们完全是技术上的障碍。这是对于历史以及未来抱有的狭隘的观念。诚然，一些科技的发展对于实现更好的未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科技本身并不会塑造历史。这些科技突破在能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前必须要面对旧有的、沿袭的财富和权利的等级制度，而并不是单单地给沿袭的等级制度顶端的人群提供更多的财富和权利。

关于未来的更全面的观念需要我们去设想现在不是永恒。改革是可能的，解决现在问题需要找到新的方法，开拓新的领域。会有一些人来提出这些解决方法，他们从骨子里就意识到，我们的社会组织对于实现我们的希望以及梦想来说远远不够。我们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些领域的启示。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社会科学并不会沉沦在关于不可能的怀疑之中。

无论是拒绝给予人们食物，还是向那些公共资源匮乏的国家竭力地兜售武器，这些在我们时代中犯下的恶行并没有受到谴责。悲观以及对价值的质疑成为我们当今的秩序。这为一种冷漠态度打开了窗口，即对于人性以及创造人类自由的必要努力置若罔闻。所有已知的人类传统似乎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诸如民主、和平以及文化的概念已经被消磨殆尽。他们意义不大，只能成为强大的观念本身的易碎的外壳。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世界中的某些东西正在消亡。我们不清楚的，是未来取代旧者将会是什么。

3000万人民现在正处于陷入饥荒的边缘。他们想要获得食物，远离干旱、山火和战争。世间的穷人被挤压在生存无望和不能迁移的夹缝中，遭受着来自未知罪名的惩罚。他们做了什么而应受如此命运？既然无罪，他们又为什么要受到惩罚？

3.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Bolivarian Alliance for the People of Our America, 简称 ALBA）是一个以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为宗旨的地区性合作组织。

维贾·普拉沙德 (Vijay Prashad) 是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执行理事。他著有二十五本书, 编辑过二十本书。这些书包括: 《贫穷国家: 全球南方的可能历史》(The Poorer Nations: A Possible History of the Global South) 以及 《黑暗国家: 第三世界的人民史》(The Darker Nati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Third World。) 他经常给 Frontline、The Hindu (印度), Altnet (美国) 以及 BirGün (土耳其) 供稿。他也是 LeftWord Books (新德里) 出版社的总编辑。

参考文献

- Annette Alstadsaeter, Niels Johannesen and Gabriel Zucman, 'Who Owns the Wealth in Tax Havens? Macro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Inequalit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7).
-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ric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5 – Growth, Poverty and Inequality Nexus: Overcoming Barrier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16).
- Brechas y transformaciones. La evolución del empleo agropecuario en América Latina, ed. Jürgen Weller (CEPAL, 2016).
- Christina Scharff, 'The Psychic Life of Neoliberalism: Mapping the Contours of Entrepreneurial Subjectivi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015).
- Corina Rodríguez Enríquez, 'Economía feminista y economía del cuidado', Nueva Sociedad (2015).
- Daniel Hoornweg and Perinaz Bhada-Tata, What a Waste. A Global Review of Solid Waste Management (World Bank, 2012).
- Deborah James, 'Twelve Reasons to Oppose Rules on Digital Commerce in the WTO' (CEPR, 2017).
- Elisabeth Armstrong, Gender and Globalisation: The All-India Democratic Women's Association and Globalisation Politics (Tulika, 2013).
- 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 Illicit Financial Flows to and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2005-2014, (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 2017).
- John Smith, 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s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 (Monthly Review, 2016).
- Junot Diaz, 'Apocalypse', Boston Review, 2011.
- Melissa Wright, Disposable Women and Other Myths of Global Capitalism (Routledge, 2006).
- Michihiko Hachiya, Hiroshima Diar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 Omar Dahi and Firat Demir, South-South Trade and Fi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ise of the South or the Second Great Divergence (Anthem, 2016).
- Planificación para el desarrollo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Enfoques, experiencias y perspectivas, Ed. Jorge Máttar y Luis Mauricio Cuervo (CEPAL, 2016).
- Prabir Purkayastha, 'Net Neutrality in the Age of Internet Monopolies', The Marxist (2015).
- Spotligh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7: Reclaiming Policies for the Public (Civil Society Reflection Group, 2017).
- Strongmen: Trump-Modi-Erdogan-Duterte, edited by Vijay Prashad (LeftWord, 2018).
- The Economic Value of Peace 2016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2016).
- The Long View: How will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change by 2050? (PricewaterhouseCoopers, 2017).
- 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UNCTAD, 2017).
-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UNCTAD, 2017).
- UNICEF,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2016: A Fair Chance for Every Child (UNICEF, 2016).
- Utsa Patnaik and Prabhat Patnaik, A Theory of Imperialism (Tulika, 2016).
- Vijay Prashad, The Poorer Nations: A Possible History of the Global South (Verso, 2013).
- Vijay Prashad, No Free Left: the Futures of Indian Communism (LeftWord, 2015).
- Wendy Wolford, This Land is Ours Now: Social Mobilis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Land in Brazil (Duke, 2010).
-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 2016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 2016).



tricontinental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是一个国际性的、致力于运动的机构，
旨在鼓励服务于人民愿望的学术性辩论。

www.thetricontinental.org